

《文艺报》3月21日“经典作家之未名书篇”专题中,载有葛涛先生的《未名社社员七封集外书信考释》一文,文中引述的七封书信中,有三封是父亲曹清华的书信。其中一封致许广平先生的信:

景元:

潘德枫先生为中苏文协老同志,忠实可靠,奋力前进。拟将豫才先生事迹,写为短篇故事。在苏联有左琴科等所写之列宁故事,颇为读者所称道。在中国可为创举。现潘先生奋勇尝试,已成数篇,特为介绍,望兄费神赐教。

再叙,祝安!

弟 丹
九,十八

信中提到的潘德枫(1908~1988),湖南洞口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1927年广州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起义失败被捕,在狱中学习过日语、世界语。1936年前后在武汉同世界语学者汤逊安、叶纲宇等组织武汉书报流通社,开展与推动世界语与抗日活动。抗战时期与父亲同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胜利后,又先后随同协友复员南京,故父亲称其是“老同志”。信中并附有潘致许先生信:

景东先生:

我今天很荣幸地第一次给您写信。

这次承曹先生鼓励,使我有勇气来试写鲁迅先生故事。我曾对曹先生说:假如我试写的万一有发表的可能,则我有一诚恳的要求:就是在未发表之前,务恳您和曹先生审阅以后方付排。想先生一定允许我这由衷的恳求吧。肃此敬颂撰安!

晚 潘德枫 谨上
九,十九

据葛先生的《考释》,从此信封落款:“南京汉中路牌楼巷51号曹寄”可看出,这是曹清华1946年5月随中苏文化协会自重庆迁南京之后写的,但因邮戳模糊,无法辨认。考虑到曹1948年7月即因接到警报而只身离开南京北上任教,因而可断定此信是1946年或1947年写的。他倾向于前者,即1946年9月18日所写。理由是:曹本人即信中所提苏联作家左琴科撰写的《列宁的故事》一书的中译者。他说:曹“从1942年1月20日开始翻译左琴科《列宁的故事》之一的《逃亡》,后来他又把所翻译的列宁的故事和一些苏联的民间故事一起编成《列宁的故事》(苏联民间故事选集),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在1946年出版”。据此猜测:潘“或许就是受到曹清华译的《列宁的故事》的启发,加上1946年是鲁迅先生逝世10周年,上海等地都在筹备纪念活动,由此萌发了撰写《鲁迅的故事》一书的设想”。

对父亲写此信的时间,我们也认为应是1946年9月18日,但依据并不完全同于“考释”。

自打抗战胜利,蒋介石便把与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共同签署的“双十协定”撇在一边,一面在美国帮助下往各解放区周边调运兵员、装备,着手发动“三到六个月内铲除共党”的全面内战;一面筹划召开伪“国民大会”,实行独裁统治。1946年5月父亲自重庆到南京后,协会的“复员”工作毫无着落。由于物价飞涨,一家人仅靠从各出版社预支的一点稿酬,连最低的生活也难维持。会长孙科只忙于竞选副总统,对协会根本不过问。父亲与先期抵达进行筹备工作的侯外

庐、先锡嘉找副会长、国民党立委邵力子商议,邵同样以“顾不上”推脱,弄得他们一筹莫展。正如父亲致友人信中说:“……已会孙、邵各三次,气候不佳,心情各异,协会毫无人管,势恐瓦解。弟虽踏破铁鞋,恐无能为力也。”他甚至说:“拟向孙、邵及常务理事会辞职。”后来,周恩来让齐燕铭转告他:国民党CC头子陈立夫正想把协会从孙科手中弄去。并指示他:孙科与邵力子仍要争取与团结,要利用他们的影响,保住协会这个阵地,不能让它落入陈立夫手中。父亲这才清楚,围绕协会存废,国民党内部高层还有这样一场争斗!后来,在周恩来具体领导与运作下,由白崇禧的高级幕僚刘仲容担任协会秘书长,意在加强孙科地位,抵制陈立夫势力。通过人员分流、缩编,缩小了协会规模与开支,总算将党在国统区领导下的这个有作为与影响的文化机构保存了下来。在各方努力下,协会“复员”工作渐入正规,并于1946年七八

全部插图。《城与年》终于在1947年9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也算了却了鲁迅先生未尽的夙愿。这些都说明,1946年,父亲由于业务往来,经常去上海,与许广平先生联系、见面机会也较多。《考释》中提到的1946年8月,鲁迅先生逝世10周年纪念活动,父亲是筹备委员会委员,不仅参加了纪念大会,还会同许广平先生,以及戈宝权、叶以群、葛一虹及BOKC代表罗尔夫等祭扫了鲁迅先生墓。

基于这些情况,我们亦倾向于《考释》推断的父亲致许广平先生的这封信是1946年9月18日写的,而非1947年。因为自1946年入秋以后,国内时局已生巨大变化:在美国支持下,国民党军队在苏皖、苏中、晋冀鲁豫各解放区点燃战火,大规模内战已全面爆发。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华北重镇张家口的当天,蒋介石不顾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反对与抵制,悍然下令召开伪“国大”,并加紧部署攻占延安……与此

从父亲致许广平先生的一封“集外书信”说起

□彭龄章 谊

同时,在国统区国民党各特务机关,也加强了对中共办事处、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的迫害与监视。协会举办的报告会、展览等,常被特务“砸场子”,甚至连我们小孩子出门,身后也长起“尾巴”。进入1947年,特别是2月底中共代表处被迫撤离南京后,白色恐怖更甚,协会正常工作已无法开展。父亲即便去上海,为许广平先生及其他友人安全计,非必要接触外,也都避免节外生枝。很难想象在那种情况下,还会向许广平先生推介诸如编写鲁迅故事这类“不着边儿”的设想。

《考释》说父亲“从1942年1月20日开始翻译左琴科所写的《列宁的故事》之一的《逃亡》,后来他又把所翻译的《列宁的故事》(苏联民间故事选集)一书,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出版”。由此推测:“或许,潘德枫就是受到曹清华翻译的《列宁的故事》一书的启发,再加上1946年是鲁迅逝世10周年,上海等地都在筹备举行纪念活动,由此萌发了撰写《鲁迅的故事》一书的设想。”据我们手边资料证实,左琴科的《列宁的故事》作于1940~1941年,原著在刊物发表时,父亲即将其陆续译出,并在《中苏文化》《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刊载,并于1941年即由重庆生活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并非如《考释》所说是1942年1月20日才开始翻译。另,《考释》说的“左琴科所写的《列宁的故事》之一的《逃亡》”,亦未见于左琴科所写的19篇相关文章中。父亲于1979年4月为叶君健、严文井、陈伯吹、高士其、冰心等翻译家、科普与儿童文学作家编辑、出版的“小学生文库”之一的左琴科著的《列宁的故事》,撰写的《新版后记》中说:“当年在苏联有许多作者依据同样的史

我出生于窑洞。

我的诗歌也发掘于窑洞。

虽早已不在窑洞里居住,但灵魂里我始终是一个窑洞的儿子。

窑洞的背影已经模糊。在大多数人还住在窑洞的时候,在我的故乡陇东,每每走近一个黄土塬,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一孔孔勾人魂魄的黑窑洞。而近处见到的窑洞,则如我的《邻家》一诗中写的那样亲和:“和神仙做伴/都没有和人做伴/心里踏实//土窑洞 一个个/肩挨着肩/一年到头/都取着暖暖/做饭的烟走上天去/也能拧成一股”。这哪里是在写窑洞,分明是在写窑洞里的人!

窑洞的前身是洞穴。作为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民居,窑洞肯定是人类在受到天然洞穴的启发之后而掘出的人工洞穴。《诗经》有云“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红土地、黑土地应该都有过人工洞窟,但黄土地上的人工洞窟无疑使用最为普遍最为持久,而且最具代表性。我的故乡陇东黄土高原,是地球上黄土沉积最为深厚的地方,从洪荒到文明,演绎着一个族群生命的传奇。陇东的黄土窑洞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它借助黏性的黄土,不用一砖一木,就能在一个黄土的截面上挖出一孔历经百年而不坍塌的窑洞来。在陇东,悠久的窑洞文化和黄土一样深厚和雄奇。

我家的窑洞在一个临沟的塬畔。父母就是在这里一口气生了4男4女8个儿女。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从出生到远走高飞离开老家,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都在这里度过,说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窑洞人一点也不夸张。未及成人,刚长出一点力气,我就和在家的几个兄弟姐妹一道跟着父母为自家挖过一次窑洞。不过,那只是在旧窑洞的基础上翻新,而不是挖新窑洞。

先人们最初的窑洞肯定粗放,而到了我这代人,窑洞已经很讲究了。挖窑洞动土方需要蛮力,但关键处都是过硬的手艺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一孔窑洞从开挖到完工入住,每个程序用的都是技艺过硬的乡土匠人。过日子,父亲是个勤劳人,也是个能人,挖窑洞出蛮力的粗活干得踏实,盘灶垒炕抹墙盖手艺的细活更见功夫。安身之所,路再远也粗糙不得呀!

窑洞与洞穴不同的地方,就是人的意识的进入和家的概念的形成。窑洞借鉴了天然洞穴的所有长处,而又有自己的创新。每孔窑洞,各家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不同的分工。比如我家的庄子,正面上有三孔窑洞,最南边的一孔做灶房,吃饭和睡人,中间的一孔是客厅,平时自己也住,但一来客人就得腾出来,北边的一孔除放着粮食而外还宅着一个天天抱着书本的“独火虫”——那就是我。

干旱坚硬的黄土造就了窑洞坚强的性格。土质好的窑洞,要住几代人呢,比今天的砖木结构的房子还要结实。村子里那些老年人,最忆窑洞的坚固。据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讲,民国有一年夜里大地震,他家的那一孔老窑洞,在大地强烈的摇晃中哗啦一声在头顶闪开一条长长的口子,窑洞里的人看了看天上的几颗星星后又哗啦一声合住了。地震之后,那孔窑洞还是那孔窑洞,一直都住着人呢!这是我小时听到的关于窑洞的最神奇的事了,以至于直到现在我还都把它作为骄傲讲给那些没有住过窑洞的人听。而地震中穿过窑顶缝隙隙的那几颗星星,则像来自古老的神话里一样,一闪一闪在我幻想的星空。

冬暖夏凉也是窑洞的性格。窑洞的这一优点,窑洞人祖祖辈辈津津乐道。深入黄土,一堵山墙封口,夹裹寒气的风雪无法侵入,所以冬天不冷;又因为深入黄土,一堵山墙遮挡,骄阳难以照射到窑洞里头,门户又通风通气,所以

夏天很凉。虽说是如此,但这暖与凉只是相对于外面而言,夏天窑里的确凉爽,但冬天窑里就不怎么暖和了。在严冬,人们最留恋的是寒窑里的热炕。一家人拥着一条被子围坐在热炕上,腿和腿挨在一起,脚和脚钻在一窝,你暖着我,我暖着你,唠唠叨叨说着话儿,不知不觉就忘了寒冷。冬天窑洞里的热炕,以及为之添柴燃火的父亲母亲,是我少年时代对家最温暖的记忆。

窑洞像黄土的肚脐眼儿,而乡情就像剪不断的脐带。写诗30多年来,我写了很多关于窑洞的诗篇,像给窑洞做的诗的笺注。甚至,我的脚下蹬出了一条通往窑洞并深入窑洞的诗歌之路:“……跟着我一直往里走/走一千里走两千里走三千里/甚至一直朝里走下去/走下去 在这黑黑的深处/如果走不进一个深深的伤口/就不算走到窑洞的最深”。诗歌里的窑洞显然比黄土里的窑洞深邃。在我这首惟一题为《窑洞》的诗里,窑洞洞穴一样“深深的伤口”,是窑洞人的命运之伤,也是我的诗歌之痛。

我企图洞悉窑洞人的命运。因为深深的黄土,窑洞与人同根而生又同命相连。住在窑洞里,最苦的就是一个上去和一个下去。这上去,是指把厕所和牲口圈里的粪一担担从坡下挑到塬上的庄稼地里,或者从坡上把场上的粮食、柴草扛回家里,沉重的粪担子、柴捆子和粮袋子压在肩上,脚下跌跌绊绊,高一脚低一脚。而这下去,还指通过一条羊肠小道下到深沟里去担水和砍柴,尤其是冬天里下沟担水,风雪茫茫,陡坡路滑,稍不留意就会滚到沟里。上下一条黄土高坡,对于肢体健全的人都如此艰难,而对于那些身体残缺的人来说就如同登天梯了。小脚母亲上坡下坡那颤巍巍艰难而酸楚的情景,至今仍然像放电影一样经常映在我的脑海里,让我的内心痛楚不已。

在我看来,窑洞里最快乐的事就是过老年。进入腊月,和大家一起把几孔窑洞和院内外打扫干净,我就用旧报纸给每一孔窑洞糊顶棚,报纸虽然也是黑的,但比烟熏火燎的窑洞墙面白了多,经一层报纸覆盖,漆黑的窑洞马上就豁亮了许多。除夕之前,我又贴门画、对联和窗花。而且,我还给窑洞的麦囤贴上“年年有余”,给箱子柜子上贴上“招财进宝”,给灶头贴上“山珍海味”,给炕箱贴上“身卧福地”。这些红红绿绿祈福似的春联儿,当然是我对未来光景的无限憧憬。

人的乐观,让窑洞里里外外红火了起来,精神了起来,并使人产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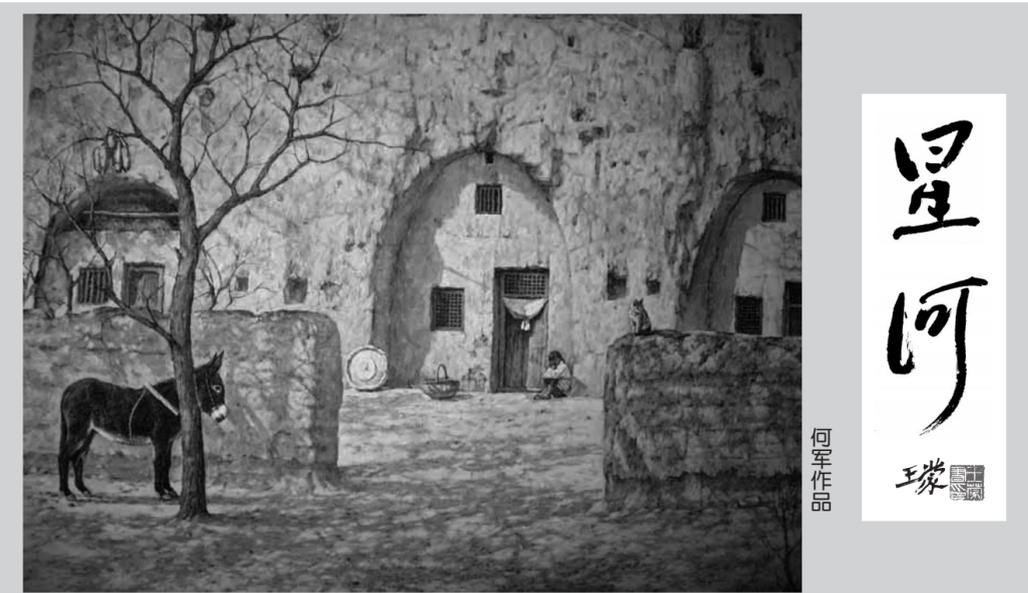
窑洞正在回归黄土。走上今天的陇东黄土高原,无人居住的窑洞,或坍塌或被浮土和野草覆盖,境界甚是苍凉。不过,就其在漫长的历史中所承载的不尽的苦难而言,窑洞的离去可能是窑洞的解脱。

进入21世纪,陇东农民因为居住条件的改变而相继告别窑洞,应该是华夏族最后走出洞穴的重要标志。神奇的陇东黄土窑洞,这一过去的生存硬实力,无疑成了我们今天进步的软实力。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蕴含着一方水土的人文精神。

豁然洞开的窑洞永远是我安放灵魂的地方。我很欣赏一位国外诗人说过的一句话: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我也坚信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没有故乡的诗人是可疑的。这样的信奉和坚信,表明我的诗歌将永远根植于窑洞里。去年,我出版了一本满是“窑洞”的诗集,名为《乡愁时代》。

在该书的后记中,我说之所以起这么个书名,是因为我企图以自己半辈子乡愁写作为这个时代命名。这里,我重申这一精神志向。

时代巨变,乡愁遍地。黑白照片一样的窑洞,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乡愁时代幽深的洞口。



何军作品

倾慕张岱

□刘成章

近读张守仁先生编选的《世界美文观止》,厚厚的一册,选的是从古希腊、从先秦迄今的全球美文精华。选入我国明朝到清初的作品,仅仅一篇,是张岱的《湖心亭看雪》。明朝存在了漫长的276年,加上清初的数十年,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小说家和戏剧家,相应地,散文高手也很多。但是,能选在这儿的美文,仅此一篇而已。张岱的这篇文章极短,只有160多字,但是,它被作为那个年代我国美文的代表作选在这里,当之无愧。事实上,一论及那个年代的好文章,人们大抵都首先会想起此文的。我一直对此文喜欢得刻骨铭心,而我的喜欢,又主要是缘于文中几个量词的奇配。

此文写的是“大雪三日”之后的西湖,“雾凇沆沆,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张岱就在他写的这些文字中乘舟而来,量词的奇配也就出现在这里,从而使人拍案叫绝:“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张岱,他真是最具创造性的绝才。他真是古今罕见的语言大师。比如这个量词“粒”吧,我们不是常用它吗?用它的时候,不是觉得它和它所指称的东西例如花生米、药片、纽扣等一样的稀松平常?可是到了张岱手里,它却和两三个大活人搭配在一起了,无比生动地描写出了阔大中的人物景象。可以说,自从我们老先人造出了这个“粒”字起,它从来都是默默无闻地蹲在一个角落,只能偶尔出来跑跑龙套,是张岱的神来之笔,一下把它推到了舞台的中心,使它发出

实,写了不同的少年读物。而关于列宁的故事,在写法上,我以为左琴科的手笔是比较高明的。同样的史实,而艺术手腕之高明与否,对读者的感染力是大不相同的。”当时苏联另一位作家斯·米列尔也曾以《列宁的故事》为题创作过类似的文章,父亲亦曾译过四篇斯·米列尔创作的《列宁的故事》,其中《小船》《三次会面》与左琴科创作的《列宁送玩具给一个孩子》《列宁和炉匠》依据的是同一史实,但写法与风格各异。

而《考释》列举的《逃亡》,我们推测,很可能就是斯·米列尔创作的《流亡生活的结束》,错当成左琴科所著了。当时,苏联民间尚流传着一些十月革命领袖列宁、斯大林,以及草莽英雄夏伯阳的故事传说,那是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了。父亲也曾经将它们译成中文,发表在《中苏文化》《文艺阵地》上,并收入1942年由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的《鲜红的花》(苏联民间故事选集)中。那时正值国共合作的抗战时期,重庆中共办事处人员,包括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回延安公干时,常把重庆出版的《中苏文化》等进步刊物和父亲编译的有关苏联反法西斯文艺作品带到延安,由延安及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出版机构翻印出版。《考释》中提及的“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是当时敌后根据地中较大的一家出版机构,有的根据地没有这种条件,便用手工刻蜡版,用油印机在很粗糙的土纸上油印。林伯渠同志有一次从延安到重庆,就曾带给父亲一些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翻印的他翻译的《虹》《粮食》《保卫察里津》等书籍,也有油印的《第四十一》。《考释》提到的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6年出版的《列宁的故事》,估计也是依据由重庆带来的版本翻印或编印的。抗战时期,在重庆是看不到延安或敌后根据地出版的书籍的,而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正是蒋介石向包括晋察冀在内的各解放区大举进攻之时,无论重庆或南京,都不可能读到那里出版的书籍。因而,倘潘德枫读过《列宁的故事》这本书,应是在重庆时就读过。或许正如《考释》所说,他由于受这本书的启发,曾萌生编写鲁迅故事的念头,到南京后,得知父亲去上海常有机会见到许广平先生,便向父亲提出尝试编写鲁迅故事的愿望,根据父亲一贯的鼓励,提携年轻人的习惯,当他得知潘有这种设想,定会热情鼓励与推介的。这或许便是这封“集外书信”的由来。只是后来时局的变化远远超出父亲他们的预料,即便当初有这种良好愿望,也曾为之做过努力,但由于形势所迫,也只能不了了之。

对潘德枫计划写鲁迅故事一事的原委,我们未曾听父母说过。原在南京与父母一起共事的那一代人都已过世,就连最后一位郁文哉先生的夫人刘惠阿姨,也在前不久以99岁高龄谢世。因而此事恐已无从查证。据我们所知,潘德枫先生在协会一直担任《中苏文化》刊物校对、出版、发行等事务性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苏友协或对外文委,担任的也是文化服务部与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行政工作,未听说有何著述。这封信,无论在父亲的《书信集》《译著文集》及2007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为纪念父亲诞辰110周年编的《曹清华纪念集》中的《佚文·书信》栏目中,均未收入,确系一封珍贵的“集外书信”。我们将会遵照考释者葛涛先生的建议,今后在增补父亲文集时将其补入。这不仅因为它它是父亲“在鲁迅生前和逝后与鲁迅夫人许广平保持联系的一个历史的见证”,而且也可从信中了解在那激烈动荡的年代,那一代人曾经的所思、所为……

笑不得。

作品的价值难道是取决于字数的多寡吗?各种文学体裁难道有高下之分吗?很有点意思。

但鄙薄短小文体者,其实并不止于个人。作家和谷最近在一次发言中敏锐地指出,散文被“当代的文学教育看重,却被文学机构轻视”。和谷揭示了这些年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依我看,当代教育努力在接地气,而一些文学机构,则是很有点腾云驾雾了。遗憾。

才情横溢笔底常含灵气的李佩芝,和我共过事,我因之知道她也像我一样地倾慕张岱,对张岱的散文推崇备至。她曾经发表过受人称道的小说,但是她好像从张岱等人的生平创作得到了某些启示,以后便矢志不渝地专写精短散文了。她直到1996年去世前的几个小时还在从事着无怨无悔的散文创作。现在,李佩芝的代表作《踏青的风日》,不但上了人数出版社的《语言》课本,而且在内地许多中学语文课堂上也频频出现,还经常被更多的人们阅读着,称赞着。这使我不得不再次想起大部头的小说来了。中国这些年每年出版的大部头小说很多,前些年有1000多部,而去年已超过2000部了,但是我想问,其中有多少少的价值能比得上李佩芝的这篇短文呢?

最近,我很高兴地看到一个报道:李佩芝的名字,已经载入了刘锡庆先生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

相隔400多年,李佩芝在阐释着先贤张岱。